

住宿，蓋為預料中事。余得此消息，因思尋訪雅麗氏醫院舊址所在，陳宜記主人陳某，謂在港經商且二十年，歷來均傳今荷里活道七十七號一連六座，皆為自雅麗氏醫院大樓所改建者，今鴨巴甸街八號，亦該醫院舊址所改建。余循鴨巴甸街南上，至荷里活道交叉處，果見七十七號相連樓房六間，皆四層樓，自右至左，為張順記、裕興製麵工場、中國書店、耀記電氣店、南記紙號、華興電氣店。地址雖不甚廣，然以之合建大樓，亦儘可用。且其右角，斜上對面，即為皇仁書院原址，今為敵機炸廢。以環境地界言之，其為雅麗氏醫院舊址，當無

可疑，則此址為國父史蹟所在，亦可知矣。余循視久之，乃復返歌賦街八號舊址，至則已改為永德生記印務店，店有樓三層，據云，係向業主代理人譚某所租賃，譚中山人，住威靈頓街寶盛源店，今鴨巴甸街歌賦街，雖尚有古舊建築，然遺老殆盡，繼起乏人。又孰知此橫街陡道，且嘗誕育偉大之革命運動耶。徵文考獻，吾黨之責焉。

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二十日與寧羅香林記於香港亞洲酒店，時率領政務視導團第五團，正候船赴汕也。

我所認識之吳雷川先生

祝文白

自七七變起，華北相繼淪陷，燕京大學，因有國際關係，雖處四面楚歌之中，不特絃誦未絕，抑且更盛於前。至三十年秋，日人偷襲珍珠港，美日邦交破裂，燕大遂於是年多突被佔領，學人四竄，橫宇荒蕪。時前校長吳雷川先生，雖已卸職，仍寓居燕大之燕北園（即朗潤園），經此劇變，生計頓蹙。余曾以此事，商之舊時師友張閔聲先生暨陳布雷學長，兩人咸願按月各奉六百元，以資頤養，正謀滙劃，忽接先生手書云：「諸君盛意可感，自度目前尚勉能自食其力，乞暫分別歸還。」等語，事遂中止，惟燕北園中，時有日寇騷擾，曩日居住園內之教授，悉已相率離去。先生正謀遷居，適翌年春，北海松坡圖書館駐館幹事梁令嫻女士辭職，荐先生自代。是職例無薪給，先以其環境之清美，可以朝夕游憩，欣然承諾。遷入後，乃乘暇臨池生書自贍，各南紙舖之交付與取件者，日接踵其門，幾不暇應接。蓋先生自民國十年以還，一變其玉潤珠圓之館閣體，而致力於北碑，晚年精到之作，置之六朝墓誌中，幾難識別，用是書名噪燕市，向之慕其書而不易遽獲者，至此咸得而購取之，願先生自視歉然，謂「非拙

書之能獲此重酬，殆受前代科名之賜焉。」潤入即豐，凡關心先生生計者，遂皆釋然，不復措意。先生夙有血壓高之疾，四年前，更患心臟擴大症，幸即治愈。去年春復發，且更加劇。夏初，其姑丈陳仲恕先生，自滬來書，詳述病況，並云：「萬不宜再弄筆墨，已向此間浙高同人，商籌醫藥費用，請更與閔聲布雷兩兄，設法集貲寄平。」自得此訊，即分別馳書轉告，閔聲先生毅然以此自任，不兩月，募集國幣六萬元，會九月中，接先生五月十六日所發手書云：「病體現已平復」。於生計問題，則一字未及。因念病後正須調養，乃商請閔聲先生，將募得之款，設法由渝轉滬滙平。忽忽數月，歲序更新，而平滬與西南之郵程，亦日形阻梗，僻居湄潭，幾無日不盼望先生手書，冀得知此款已否收到。乃三月初，突接蘭州由滬上轉來音訊謂：「先生於去歲十月二十九日，因中風不治，在平逝世。」驟聞此耗，始而駭，繼而疑，終以其不起之故，與往時病情悉合，又審知此訊之填無可疑。然私心猶妄冀道路遼遠，傳聞或訛，願未及半月，而渝滇筑各大報紙，均載北平中央通訊社「吳雷川先生在平逝世」之消息矣。

先生之言論行誼，道德文章，時賢多有論列，惟先生中歲以前之事蹟，世人或不深悉者。余受知於先生，逾四十年，中間講學燕大，同寓於朗潤園者又十年。便坐雅談，無間晨夕，遺聞軼事，耳熟能詳，不揣簡陋，謹述斯篇，以驗當世，藉誌余哀。

先生籍隸浙江之錢唐，原名震春，字雷川，晚歲以字行，清同治九年，生於江蘇之蕭縣，長於徐州及清江浦兩處。十六歲舉茂才，二十四歲舉孝廉，二十九歲成進士，廷試後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旋丁內外艱，例不得與散館試，及服闋而科舉廢。宣統二年，始以「在籍辦學者有成績」入京引見，授職翰林院編修。入民國後，元年被任爲浙江教育司僉事，旋調京爲教育部僉事，任文書科科长。十三年，升任參事，十五年，辭職，十七年多，國民政府簡任爲教育部常務次長，翌年夏辭職，自此不復入仕，時先生春秋已六十有一矣。綜其一生，致力最久，而最感興趣者，莫如教育。清光緒二十九年，先生家住清江浦，時江北高等學堂，成立伊始，以先生爲監督，顧未及半年，因從家辭去，是爲生平辦學之發軔。至三十二年，回籍，任浙江高等學堂監督，在職凡五年，時全堂學生三百餘人，先生一見，即能舉其姓名，相處如家人子弟，尤喜閱諸生課藝，教師每批改畢，輒先送監督室，先生見佳製，必加批語以激獎之，用是人人爭自濯磨，蔚成風氣。平日和氣盎然，從未見其有疾言遽色，穆穆焉如春風時雨，遇之者，每於不知不覺之中，受其嘔拂與霑溉，而澹然自適，陶然自醉，其愉快有不可名言者，故一時教者學者，咸敬而愛之，蓋五年如一日焉。善夫吾友陳君布雷之言曰：「吾浙江高等學校，承求是書院之舊址以設學，其學風乃獨以和易著，曠乎其大，淵乎其靜，窈乎其莫可得而名，學於其中者，從容乎，夷猶乎，與規條節文相忘而無或稍有畔越，蓋吾師監督吳雷川先生所規制，吾師教務長王偉人先生爲之紀綱，而吾師張閔聲先生，與偉人先生最相友善，實左右而翊成之。吾校設校，凡十載，卒學者先後數百人，著籍遍浙東西，成就各有大小，然未有一人焉，以傲岸囂競見譏於當世，或辱身以敗行者，此殆童時

之薰習然也。」

宣統二年，辭職進京，同鄉京官，又公推爲浙江旅京學堂監督者凡一年，至民國四年，先生已信基督教，交接中外教友日益多，而美人司徒雷登氏以生長杭州，自附於鄉誼之末，對先生尤致敬慕，十三年夏，一再商懇往燕大兼任教課，因允焉。及十五年夏，燕大遷入海澱新校舍，先生遂辭去部務，而專注其精力於燕大。綜計二十年以來，除十八年多，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半年，及三十一年，移寓松坡圖書餘以後，其餘歲月，咸銷磨於燕大之中，宜乎燕大同人，不能一日忘情於先生，而司徒雷登氏，尤不勝其感戴，嘗言：「余對於雷川先生之欽暹，由來已久，當二十餘年前，余初抵北京時，已熟聞先生之道德文章，及晤見後，接其溫嚴，樂其雅亮，所得印象益深，逮後往還酬酢，繼復共事綢繆，此初得之印象，終未有絲毫之磨滅。曩者燕京大學，舍宇未宏，聲譽未著，先生肯來執教，且兼任副校長，既復辭去教育次長之任，來長我校，以其一生隆重之聲望，與純熟之經驗，完全供給燕大，……」燕大自遷校海澱後，十餘年間，中西教授，何啻數百，前後學子，何啻數千，每言及先生，莫不翕然推服，然終不若司徒雷登氏此區區數語，爲能得其實而扼其要焉。

先生一生，實以輓近三十年最爲舒適，可名之爲新生活時期，即信教時期也。前此四十餘年，除未結婚以前之十六年，尚在童稚，無關得失，其中間之三十年，是爲先生心靈最感痛苦之日，憤懣填膺，莫可告語，漫漫長夜，待旦無期，然孤臣孽子，操危慮深，後日之能披荆斬棘，躍出叢莽，發見更幽美聖潔之新天地，以慰其餘年，其機蓋早伏於此時，故先生嘗自言：「一生經歷之境遇，以在清江浦時，最爲困苦，但一生得力處，亦在此一時期。」

欲知先生憂患之所自來，不能不略述其家庭狀況，先是先生之母太夫人，隨侍其翁宦游徐州，先生之父，則在清江浦充辦稅局差使，先生常往來於徐州與清江浦之間。及十六歲入彀，翌年，進京與邵夫

人結婚，又逾年，應其父回清江浦隨侍之命，欣然偕其夫人，攜新生子南旋，不意其父兩年前，已在清江浦置有側室，時家政全由側室主持，於先生夫婦之來，非其所願，故到家後，即隨事挑釁，動輒得咎，先生夫婦，幾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。顧先生性純孝，以父年逾知命，既不忍飄然遠引，又不敢自乃祖，且恐傷母氏心，茹荼飲孽，習焉安之，然邵夫人卒因此而致神經病，以損其天年焉。先生自經此變，因嘆倫常桎梏之苦，較任何刑為慘毒，更念九州萬姓之中，數千百年來，犧牲於此種禮教之下者，寧可以數計，孝己、伯奇、申生、符起，特其著焉者耳。由是默蓄改造社會之志願，始則精研宋學，繼則探討墨學，汎覽佛經，先後用力十餘年，雖未能遠發見一種具體而可實踐之途徑，然已審知欲事改革，非先備有平等與博愛之兩條件不可。故中歲以前，即篤行此二事，雖家無餘資，而好施不倦，凡窮困學生，或途人童子，苟有求於先生，莫不慨然相助，至於戚族故舊之屬，更無論矣。又因力主平等，故不立崖岸，不使僮僕，人無老幼貴賤，一以禮接之，故人人樂與之交。及中年喪偶，遽苦無家，寓中不能不蓄一僕為之經紀，先生乃視同猶子，僕之子亦比諸孫焉，人或以為異，而先生則視為固然。故自中年以來，其心靈上之痛苦，似已稍稍解除，及民國三年，供職教部時，與其舊日同年徐某為僚友，且同寓一胡同，衡宇相望，歡情自接，徐固基督教信徒也，晨夕清談，偶涉及基督教義，頓覺默契於心，一若此教特為彼而設，以解救其心靈之痛苦者，積二十餘年之力，冥思苦索者而未得者，一旦邂逅相遇，其樂為何如耶？故翌年遂入中華聖公會，領受洗禮。時人多有未深悉先生之生平及其所抱之志願者，驟聞此事，不免有所駭異，先生因發表其信教之原因有二：「一、目睹社會種種不安之現象，似非尋求改良途徑不可，一旦與基督教會中人接觸，以為渠等傳教如此熱心，必是基督教具有改良社會之功效。二、我個人雖然有志向上，而不能力自振拔，以致時常感到痛苦，因此希望基督教能與我助力，俾得知人生之真諦，不致虛度此生。」蓋先生少壯時之家庭環境，與瀏陽譚壯飛

氏，如出一轍，故兩人所孕育之思想，亦復相同，特譚氏才氣豪放，情詞激烈，未若先生之中和有蘊藉焉。譚氏曾痛詆荀卿，謂兩漢後，孟學絕而荀學傳，苟合迎合君主以求榮者，自君主之毒焰張，而天澤之分愈嚴，而倫常之禍愈烈，思衝決世間一切之綱羅，嘗融合儒墨佛耶諸教義，而成仁學一書，亦一熱心改革社會家也。先生則夙主力行，不尚空談，其主持高等教育時，尤喜以身教，不以言教，故中年以後，未嘗著書，晚近始應上海青年協會之請，寫成兩書：「一、基督教與中國文化」，「一、墨翟與耶穌」，先生曾說明寫此書之本意：「一方面冀能藉此領導青年人之信仰，不致流於狹隘，又一方面冀能減少一般舊學者，對於基督教之蔑視與誤會。」先生平日於基督教之規制與禮儀，不甚重視，惟堅信耶穌改造社會之計畫，與犧牲自己之精神，其於「墨翟與耶穌」一書中，更明言：「耶穌在世所作之事，不是要創立宗教，乃是要改造社會，所以耶穌並非宗教家，而是社會革命家。」此二書在滬出版後，流行極盛，而張菊生先生更稱為「近代不可多得之書，亦人生不可不讀之書。」

先生自信教後，氣體愈充，容色愈粹，白髮童顏，皎然輝映，一望而知為道行有得之人。余與先生一別九年，寤寐羹牆，無時或釋。三年前，承先生寄示最近攝影，神采奕奕，不減昔時，方謂期頤可致，即先生來書亦云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況復過之，老懷已無所繫戀，惟猶願及見最後勝利，以傲放翁耳。」摩挲遺簡，墨落猶新，而宿草將列，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？世變方殷，需才孔亟，願師易得，人師難求，緬想芳型，悲何能已。吾浙馬夷初先生敘倫；夙以經濟文章自負，於人少所許可，獨心折先生，且願北面而臣事焉，茲錄其壽先生七十古詩一章，以結束余文，並證斯篇所述，絕非一人之私言也。其詩曰：

「吾鄉一長老，姓名吳震春。先世為管飽，又有絲羅親。吾少知嚮往，以親審其人。其人實斌媚，其行正而醇。其德兼儒墨，其道大以真。心具平等性，無財偏濟貧。」

墨翟不可比，求之又寡倫。少年茹殊苦，中歲斷婚姻。老懷復不暢，孜孜手足勤。如今七十年，顏色兒子新。吾生鮮傾折，於丈願爲臣。吾貧不具禮，寫實壽貞珉。」

周

易

考

施之勉

此文於三十四年六月在涇潭脫稿後，即寄交遵義思想與時代月刊發表，旋該刊因準備復員，暫停出版，遂爾稽延至今。 作者附識

鄭玄易贊及易論云，周易者，言易道周普，無所不備。然其說無所據之文。易緯云，因代以題周，則可以左傳國語證之也。左傳，莊二十二年，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，陳侯使筮之。宣六年，伯廖曰，無德而貧，其在周易，豐之離，弗過之矣。十二年，知莊子曰，周易有之，在師之臨，曰，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襄九年，穆姜曰，是於周易，曰，隨，元亨利貞，无咎。二十八年，子太叔曰，周易有之，在復之頤，曰，迷復凶。昭元年，醫和曰，在周易，女惑男，風落山，謂之蠱。五年，穆子之生也，莊叔以周易筮之，遇明夷之謙。七年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，曰，元，尚享衛國，主其社稷。二十九年，蔡墨曰，周易有之，在乾之垢，曰，潛龍勿用。哀九年，陽虎以周易筮之，遇泰之需，曰，宋方吉，不可與也。國語，司空季子曰，是在周易，皆利建侯（晉語）。蓋易爲周室卜筮之官所作，故謂之周易。考左國二書所載，有周詩（見國語晉語），有周書，（見左傳僖五年、二十三年、宣六年、十五年、襄三十一年，又國語楚語）。有周禮，（見左傳閔元年、僖二十五年、文十八年、昭二十九年、哀七年，及國語晉語。）有周樂，（見左傳襄二十九年），皆指周代而言，則周易者，因代以稱周，不得別有它說矣。

史後紀一引作六畫，說卦，易六畫而成卦。是伏羲畫卦，最先出於管子矣，而管子一書，則戰國時人所作也（據朱子說）。莊子但謂伏羲得至道，至管子而云作造六畫，繫辭則詳言仰觀俯察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作爲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矣。周禮龜人鄭注，引世本作曰，巫咸作筮。（巫咸作筮，並見呂氏春秋勿躬篇。）書君奭云，在太戊時，則有巫咸，又王家。書序云，伊陟相太戊，贊于巫咸。孔疏引鄭書注云，巫咸，巫官。史記天官書曰，昔之傳天數者，高辛之前重黎，於唐虞義和，有夏昆吾，殷商巫咸，則作筮者，爲殷巫咸也。（先儒謂洪範發之於禹，箕子推衍增益而成爲，則篇中所述筮占用二，殆爲殷商之事，非夏禹之世，即有筮也。）古者，王前巫而後史，卜筮醫術，皆在左右（禮記禮運）。巫咸以巫接神事太戊，蓋幽贊用著，作爲巫法，四營而成易，十有八變而成卦，畫卦重卦，皆其所爲矣。畫爲八卦，以寓萬物之象，重爲六十四卦，以極天下之變，故易以八卦爲體，六十四卦爲用也。（周禮、太卜、周易、其經卦八，其別六十有四，即是此意。）夫有著而後有筮，有筮而後有卦。賈公彥曰，伏羲未有揲著之法，至巫咸乃教人爲之，然則幽贊用著，非伏羲也（周禮疏）。伏羲既未知用著，未有筮法，何得謂其畫八卦，而爲重卦之人乎。

伏羲作易八卦，疑起六國時，託之伏羲也。莊子，夫道，有情有信，无爲无形，伏羲氏得之，以襲氣母（大宗師）。管子，感犧氏作造六畫，以迎陰陽，作九九之數，以合天道（輕重戊）。六畫，路

繫辭云，易之興也，其當殷之末置，周之盛德邪，當文王與紂之事邪。鄭玄據此，以爲卦辭爻辭，並是文王所作（周易正義）。但